



祖国丛书

护国运动主将 蔡 锷

丁凤麟 施宣圆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祖国丛书
护国运动主将
蔡 锷

丁凤麟 施宣圆 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张 臻
封面装帧 沈蓉男

护国运动主将蔡锷

丁凤麟 施宣圆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 54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颀桥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25 插页 2 字数 78,000

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8,000

书号 11074·620 定价 0.43 元

目 录

- 引言..... (1)
- 1 寒门学子 立志救国..... (2)
- 2 留学日本 探求真理..... (11)
- 3 投笔从戎 治军报国..... (24)
- 4 重九举义 光复昆明..... (34)
- 5 治理云南 出师川黔..... (45)
- 6 奉调赴京 伴食权门..... (58)
- 7 智脱虎口 密谋讨袁..... (71)
- 8 同仇敌忾 举旗护国..... (84)
- 9 威震华夏 再造共和..... (93)
- 10 中道殒逝 魂归岳麓..... (108)
- 附录 生平大事年表..... (125)

引 言

1905年(清光绪三十一年)春天,当中华民族还在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下,不时发出痛苦地呻吟之际,一位风华正茂的二十三岁青年,只身踏上湘江之畔的岳麓山巅,放眼祖国的大好河山,浮想联翩,情不自禁地口占一绝:

苍苍云树直参天,万水千山拜眼前。

环顾中原谁是主?从容骑马上峰巅。

这首题为《登岳麓山》的诗作,抒发了一位青年爱国志士的宏伟抱负:为了祖国的安危和民族的命运,誓志横刀跃马,搏击在时代漩涡的峰巅。转眼十余年,当这位爱国志士为铲除反动黑暗势力而耗尽毕生心血之后,他又安详地长眠在当年立志报国的岳麓山巅。

这位受人敬仰的爱国志士,就是当年以杰出的军事才干,为振兴中华建树了丰功伟绩的蔡锷将军。让我们沿着这位先烈走过的足迹,追觅他为寻求救国真理而英勇搏击的艰难历程……

寒门学子 立志救国

近代中国，人文荟萃的湖南，曾涌现一大批出类拔萃的英雄人物。蔡锷，便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。

正象一切不平凡人物都是从平凡的条件中陶冶出来的



蔡 锷 像
(1882—1916)

一样，蔡锷也是从旧中国一个极其寻常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。他的成长道路，也是历经坎坷、曲折，并无任何独特的优越条件。

1882年12月18日（清光绪八年十一月九日），蔡锷出生在湖南宝庆县（今邵阳市）城东的亲睦乡一个贫寒农家。据说，母亲王氏在分娩前，梦见自己上山打柴，在山坡上不慎被一棵松树绊倒。梦醒后，婴儿降生，因而取名

松坡，学名叫艮寅。蔡锷这个名字，还是1900年赴日本留

学时改的。

宝庆虽是湘西的一个中等县城，风景秀丽，物产丰饶；但在封建统治下，又显得十分闭塞和贫穷落后。至于蔡锷的家庭，更属于典型的寒门，祖祖辈辈靠种田糊口，素来清贫。父亲蔡正陵，原先也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民，但为人极其勤奋好学，躬耕之余，还学得一些缝纫手艺和文化知识。蔡锷排行第二，五岁那年，兄弟姐妹已有五人，加上祖母和父母，八口之家，光靠父母种田收获维持生活，势必难以为计。于是，蔡正陵领着一家老小，由宝庆迁居武冈县西的山门黄家桥。黄家桥是比较繁荣的农村集镇。起初，心灵手巧的蔡正陵，在家接点针线活，给人缝衣为生；后来，又在镇上一家商铺里谋得一个店员的差使。不久，因为他粗通文墨，又在镇上办起一所简陋的私塾，教授蒙童，以菲薄的束修来维持生计。

蔡锷六岁那年，已到了开蒙的年龄。为了使孩子学得一点文化，便于将来立身处世，蔡正陵便将儿子安置在自家的私塾中，亲自课蒙。小松坡聪颖好学，进步很快，三四年间，已将“子曰”、“诗云”之类的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通读完毕。十岁那年，已能写出一手比较畅达的文章。据说，小松坡有一次去购买作文格纸，店主见这位小顾客活泼伶俐，便笑着对他说：“来，我们打个赌。你如能对出我的上联，我的纸就免费赠送，怎么样？”小松坡含笑说：“行！”店老板搜索枯肠，也想不出一个适当题目，忽然见到作文格纸中缝间印有“三元及第”四字，便信口说：“小学生三元及第！”岂料松坡立刻答道：“大老板四季发财！”听到这句对仗工整的恭维话，店主

十分高兴，当场兑现诺言，免费给小松坡一叠作文格纸。从此，松坡便以才思敏捷而闻名乡里。

对于孩子学业上的猛进，蔡正陵自然喜在心头，但他的文化根底原本不厚，渐渐不能适应对松坡的教育了。为了使孩子将来能挣得个好前程，他便将儿子送到当地的一位知名学者樊锥的门下，继续攻读。

樊锥（1872—1906年），字春渠，湖南邵阳人。他不但以学识渊博闻名乡里，而且思想开通，是当地一位积极拥护变法维新的名士。樊锥还是一位善于奖掖后进的学者，他早就听说，同乡蔡正陵家中出了一位聪明好学的少年，求知欲极强，经常翻山越岭到亲友家去借书读，手抄笔录，记诵在心。如今见蔡正陵将孩子送上门来，岂能拒之门外？于是，樊锥立刻免费收为弟子，悉心加以教诲。在名师的教导下，松坡的学业进步更快，不但读完了先秦诸子之学，而且思想也有了很大提高。

此时此际，松坡多么盼望将来也能象自己的老师那样，成为一名为社会作出建树的知识分子呵！然而，当时的家长们，都希望自己的子孙通过科举考试发迹，蔡正陵当然也不例外。1895年春，正逢县里举行童生考试，十三岁的松坡，便在父亲的陪同下赴县应考。

这次应试，乡里父老们还风闻到如下一段佳话：当考生们鱼贯进入考场时，蔡正陵深怕孩子太瘦小，中途挤杈了，索性将他骑在自己的脖子上送进考场。监考的知识县生奇怪，忙将蔡氏父子截住，想当场试试这位可爱的小考

生。知县即景说出一句上联：“子将父作马”。松坡连忙应声对答：“父愿子成龙”。听到这句十分得体的下联，知县暗自佩服这后生的敏捷才思，既惊又喜，连忙大声称赞：“神童，神童！”从此，松坡又得了个“神童”的美名。

进场之后，主要是受试史学、词章，松坡的成绩名列前茅。尤其是当场写的一篇行文畅达的文章，更博得了主持这次院试的湖南学政江标的赞赏，被补为县学生，算是考中了“秀才”。

江标（1860—1899年），字建霞，江苏元和（今吴县）人。1894年任湖南学政，是当时知名的维新派。在湖南任职期间，他识拔了不少有志青年，黄兴、谭人凤、唐才常等人，都先后出自他的门下。这次考试之后，江标特地叫学官将他最赏识的三名新选秀才蔡良寅、石陶钧和李本深，请到居处闲谈。江标对他们说：“邵阳先辈魏源，你们得知吗？”“读过他的书吗？你们要学魏先生讲求经世之学。中国前途极危，不可埋头八股试帖，功名不必在科举。”这席语重心长的话，使三位生长在偏僻乡村的年轻学子，既感到十分新鲜，又受到极大启迪。松坡的心情更是久久不得平静，他不但领悟到应该怎样读书，读书就应该象同乡先辈学者魏源那样，力求“有裨世用”；更感到读书人的担子不轻，在提高学识的同时，应关切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。

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，又是怎样呢？就在松坡考中秀才的这一年，神州大地面临着一场新的震撼。古老的清王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又吃了败仗，由于丧权辱国的《马

关条约》的签订，日本不仅侵占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大片领土，攫取了白银二万万两的巨额赔款，而且获得了在中国直接设厂制造的侵略特权。严酷的社会现实，亡国灭种的危机，震惊了朝野。凡是有爱国心的中国人，都对清王朝的腐败现状丧失了最后一点信心，纷纷重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。为了救亡图存，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为代表的一大批维新志士，站到了历史的前台，奔走呼号，积极倡导维新变法运动，希图效法日本走过的道路，经过自上而下的改革，把封建专制的中国，导向君主立宪式的资本主义彼岸。

这场维新运动，经过光绪皇帝的大力支持，迅即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的反响。尤其是处长江中游的湖南，更成了维新运动的重要基地。湖南巡抚陈宝箴（zhēn 真），在清廷督抚群中，是唯一真心实意倾向维新的地方大员。在他的周围，更集结了一批诸如按察使黄遵宪、学政江标及其继任徐仁铸等具有维新思想、积极主张变法的中坚力量。在陈宝箴等人的支持下，湖南的维新浪潮蓬勃发展。1897年4月，江标、唐才常等人创办了《湘学新报》（后改名《湘学报》），“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”（《湘报馆章程》），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和社会学说，号召救亡图存，大造变法舆论。同年10月，由谭嗣同等人发起，陈宝箴、黄遵宪、江标等人，决定在长沙小东街（今中山西路）创办湖南最早的新式学校——时务学堂，作为培养新政人才的基地。在学堂任教的大都是激进的维新志士，以谭嗣同为学堂总监，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，李维格（逸群）为英文总教习，唐才常等分任讲

席。课程设置根据维新运动需要，一面讲“西儒学说”，一面阐明“中国经世致用之学”。1898年春，谭嗣同、唐才常等还以“讲爱国之理，求救亡之法”为宗旨，在长沙发起并成立了南学会，由黄遵宪、谭嗣同等轮流主讲学术、政教、中外大势、自然科学等知识，积极宣传维新变法主张，动员官绅变法图强。陈宝箴甚至亲临讲堂宣讲，为之倡导。

1898年3月，正当百日维新的大幕即将正式揭开之际，闻名乡里的有志青年蔡良寅，在继江标之后担任湖南督学的徐仁铸的亲自推荐下，来到长沙投考时务学堂，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，被录取为头班学生。从此，他不仅与梁启超结下了终生不解的师生之缘，而且在谭嗣同、唐才常等维新志士的教诲、陶冶和影响下，通过刻苦学习和认真钻研，学业上有了飞快长进，思想觉悟得到迅速提高。在头班四十名学生中，他的年龄最小，只有十六岁，但是每月月考皆居前列，英气蓬勃，同学都很敬慕他。在时务学堂认真学习的同时，他还积极参加南学会的活动，经常在《湘报》上发表文章，锋芒初露，引人瞩目。后来，梁启超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回忆这段教学经历时，也说：“启超至，以公羊、孟子教，课以札记。学生仅四十人，而李炳寰、林圭、蔡锷称高材生焉。”

梁启超称蔡锷为“高材生”，是名副其实的。据说，梁启超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授之外，课余便安排学生撰写读书笔记，交师长予以批答、指导；发还札记时，师生再相与坐论，共同切磋学问。通过读古书，释古义，褒贬时政，探求救

国救民的道路,从而确保学生的学业和思想,都能得到切实的提高。蔡锷在时务学堂撰写的作业,虽已存留不多,但从当年收录在《湖南时务学堂初集》中署名蔡良寅的《问答》、《札记》,以及发表在《湘报》上的《〈后汉书·党锢传〉书后》、《秦始皇功罪论》等论文的内容来看,不但反映了蔡锷学习上刻苦求真的精神,更体现出救民救国思想的初步形成。

《〈后汉书·党锢传〉书后》和《秦始皇功罪论》,都是借古喻今、针砭时政的激烈文字。前篇从总结历代党争入手,道出了历朝“民贼”对百姓的盘剥,是造成国家灾难的祸根;进而大胆指出清末的中国,正处于“无日无祸”的困境之中。如何才能振作有为呢?他大声疾呼:“国之破不足虑,种之厄不足虑,惟教之亡足虑。心之死,气之销,足为大虑!”他多么希望中国也能出现象德国的俾斯麦^①、美国的华盛顿^②那样的“一二豪杰之士”,带动四万万同胞,“张国势,复国仇”,成就维新大业呵!后篇则从剖析秦始皇的功过入手,尖锐地指出秦始皇之所以成为“千古之大罪人”,在于他闭目塞听和因循守旧,这是造成秦始皇悲剧的症结所在。

《湖南时务学堂初集》中刊载的《问答》和《札记》,更如实反映了梁启超对这位学生的谆谆教诲,以及蔡锷善于独立思考的优良品质。梁启超对蔡锷所撰写的读书札记,凡是

① 俾斯麦(1815—1898年),普鲁士首相,德意志联邦总理大臣,统一德国的代表人物,有“铁血宰相”之称。

② 华盛顿(1732—1799年),美国第一任总统,美国独立战争的领导者。

确有见地的片断，不时击节称道，批下“通极”、“比例精当，见地莹澈”之类的赞语；如果发觉有领会不深或比喻不当，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。

有一次，蔡锷写下一段心得，既肯定了孔子“讥世卿”的功绩，又看到了孔子观点的流弊，提出西方的议院制度更加尽善尽美。可是，梁启超对此却不以为然，批道：“‘流弊’一语极谬。”并指出，所谓孔子讥世卿，立选举，这完全是你有感于今天科举的极弊，才发此言。你不责备历代奉行的不善，而称之“流弊无穷”，此言错极了。至于行议院之法，何必归功于西人呢？孔子早就深知其意，常常提到此类言论。

又有一次，蔡锷在读《春秋》札记中，认为《春秋》不是改制度的书，而是用制度的书，“如视其书为改制度之书，视其人为改制度之人，则孔子不能逃僭越之罪矣。”这段心得，颇有点锋刃，大胆同康有为鼓吹的孔子托古改制的观点，唱起了反调。梁启超当然不赞同，写下一句“此论犹属似是而非”的批语。但梁启超毕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良师，对弟子的逆耳之言，不是简单地一批了事，接着又详细剖析了孔子在《春秋》中阐述制度的种种内容，以及制度必须随着时势而不断变更的道理。他摆出事实，证明《春秋》所规定的制度中，确有“孔子自创之制”。在讲完自己的道理后，他深怕这位高材生一时想不通，最后又写了“下次可详辨”的话。

师生之间论争的具体是非，权且不论，但这种相互切磋、认真探求真理的良好学风，尤其是梁启超反复阐述的思想、制度必须随着时势而改革的观点，不能不在蔡锷的心灵

深处，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，促使他思想的觉醒。课余之暇，他经常同三二同窗好友一起议论时政，每当谈到当时的政治败坏，常常声情激越，并立志要贡献出自己的一切，以报效国家。在维新运动高潮中，十六岁的蔡锷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报国志向，期待着有朝一日，也能象自己的导师梁启超、谭嗣同那样，在变革中国恶劣政治的斗争中大显身手，成为一名真正的勇士。



留学日本 探求真理

在封建专制的中国，要真正闯出一条革新之路，是困难的。在难忘的 1898 年（清光绪二十四年），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所代表一批维新志士，为了实现变法图强，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。可是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势力一加反击，形势立刻发生逆转：不愿当亡国之君的光绪，被软禁于瀛台；谭嗣同为首的“六君子”，血溅菜市口；康有为、梁启超不得不亡命海外。戊戌变法只壮观地推行了一百零三天，便昙花一现似的夭折了。中国社会，又回复到变法前那种窒息、沉闷的气氛之中。

戊戌政变发生后，一切维新设施都遭到彻底否定或清算。在湖南，顽固派对维新派的反攻倒算更加猖獗，湖南巡抚陈宝箴及其周围的维新志士，都无一例外地遭到弹劾（hé 核）或处治；连写过两篇提倡民权文章的樊锥，也被当地顽固劣绅逐出了湖南。培养新政人才的时务学堂，更理所当然地被勒令查封、解散（后改为求实书院），甚至一些在校攻读的青年学生也遭株连，蔡锷当然也不能倖免。早在 1898 年 8 月，湖南地方当局选一批优秀学生留学日本，应

试者五千人，时务学堂的学生几乎全部报考，结果录取了七十人，蔡锷名列前茅，以第二名入选。当他正整装待发之际，戊戌政变爆发了，赴日留学便成了泡影。时务学堂被解散后，求知心切的蔡锷，打算继续求学，与同窗学友唐才质（唐才常之弟）等四出奔走，希图转入长沙的其他学校，但时务学堂出来的学生，好象都有“新党”之嫌，各校皆拒而不纳。但蔡锷仍不死心，又约了同学石陶钧，一度冒险转道武昌，打算进入两湖书院继续深造，结果仍由于同样理由，又被拒之门外。

蔡锷为之愤嫉、惘然、失望。岂料在失望中，忽然风闻敬仰的老师梁启超，已亡命到日本，于是又勾起了一线希望。次年春夏之间，他串连了时务学堂中的唐才质等十一位同窗，决定结伴同行，去万里寻师，投奔梁启超。十一位意气风发的有志青年，在凑起一点有限的盘缠后，毅然沿江东下，打算转道上海，再伺机东渡。可是，到了上海，川资差不多用完了，蔡锷的口袋里只剩下方孔铜钱一百二十枚。飘洋过海暂时不行了，如何争取先在上海落脚呢？他们在窘迫之中，想起了时务学堂的英文总教习李维格，眼下他正在上海南洋公学任教。于是，他们凭借昔日的师生情谊，在李维格的帮助下，暂时寄居在南洋公学的学生宿舍；又抓住该校暑假招生的时机，一齐考入南洋公学。这时，梁启超已得悉蔡锷等人的行踪，以及他们对东渡求学的渴望，便于1899年7月来函召蔡锷等人东渡日本。正在日本的唐才常，又设法给他们汇来了路费。于是，蔡锷、唐才质等十一名青年，便从上

海启程,泛海东渡,寻到了梁启超,开始了留学生涯。

当时,梁启超在日本东京小石川区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子,师生十人凑在一起生活,晚上打地铺,一同挤在地板上睡,早上卷起被窝,每人一张小桌念书、写字,又过起了简朴而清苦的学校生活。为了能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继续探求新知,他们刻苦补习日语和数学,为投考日本的有关学校作准备。经过九个月的准备,蔡锷终于考进了东京大同高等学校。这所学校是为了专门培养刚到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而创办的,由梁启超任校长。学校的条件虽然简陋,但蔡锷珍惜一切时间,认真攻读西方的政治、哲学课程,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,耳目为之一新。不久,大同高等学校在旅日华侨的资助下,新建起校舍,条件有了改善,更名为“清华学校”,聘请日本社会名流犬养毅为名誉校长。但蔡锷此时却改入横滨的东亚商业学校,继续刻苦地探求新知。

学校的生活虽然紧张而艰苦,但蔡锷在勤奋学习的同时,仍十分关切祖国的前途与命运,积极投入留学生的爱国活动。他常常在梁启超主办的《清议报》上投稿,还与刘百刚、吴禄贞共同创办“励志会”。1900年春天,在改良派中思想比较激进的唐才常,在上海发起成立自立会后,又在东京留学生中发展自立会会友筹组自立军。他一面接受康、梁的指导,一面又遥戴孙中山为“极峰”,企图联合革命派和改良派,实现已经破了的变法维新。唐才常等人策划返回国内,掀起旨在“勤王”的武装暴动,拥戴光绪皇帝重新当政。